

财税体制改革重头戏是调整央地关系

周子勋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前面临的诸多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重要事项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财税体系是由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随后税制调整中逐步形成的。迄今为止,地方税收体系仍未能成型。在中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基本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省以下政府组织基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其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实情自主决定,造成财权划分极不规范,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向省、市级财政集中,县乡财政日益困难。财权层层向上集中,上级政府的拨款又被层层截留,造成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用45%的预算财力承担75%的事务,这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财力事权不匹配。同时,地方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虽然中央财政每年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效率不高,转移过程不透明、不重视绩效考核的情况较多。此外,目前内地间接税过多,直接的财政税少,也是造成收入分

配不平均的主因。

显然,这个制度导致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地方政府为应付财政压力,纷纷大举卖地、借贷,当前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风险等宏观领域矛盾也是由此造成。网上曾流传过一个段子,内地某个城市的市长面对媒体记者算了一笔账,曾豪迈地表示,“给我5年,投入百亿挣回千亿。”地方之所以对举债情有独钟,与现行的财税体制有一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地方债问题也需要财政体制改革来配套。只有基于理性思考来主动调整相关财税制度,才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之道。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交汇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之一,牵涉中央地方财权、地方债务、收入分配、楼市等。通过调整央地关系,重新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一背景之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强调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早在今年7月11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就表示,正在酝酿财政改革

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方向之一是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这一信号很重要,最重要的看点是分税制。分税制以往只是中央与地方的分账收钱,今后的改革是否会涉及到地方政府花钱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如果今后针对分税制的改革延伸到中央与地方花钱方面的调整,势将对地方政府形成更大的约束。

在笔者看来,财税体制改革要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某种程度上说,当前财税改革的关键,是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的问题,这方面不做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也难以进行。必须记住,财税改革是个繁杂系统的改革,有近有远,有紧有松,目前,央地财税关系的调整最为迫切。其实,事权的划分在现阶段实际是一个伪问题。中央与地方在事权划分上实际存在两种解读,中央有中央的事权理解,地方有地方的事权理解。如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寻求一种非压力下的统一认识,并让大家上下一心,共同遵守执行,非十年之功不可能达成。比事权划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划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这一条做到了,事权的划分就有基础,会比较好办。

当然,当前财税改革面临的一个重

大挑战是,当土地制度改革启动后,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收入必大减,当前最迫切的是培育地方税体系。实际上,财税改革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分钱”(划分财力),还包括“分权”,即中央与地方划清事权,明确地方政府有哪些权力,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做主。中央目前推动的简政放权,不只是政府向市场放权,还包括中央向地方放权。

更重要的一点是,预算改革是建立公共财政的关键一步,同时也是政府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这实际上是是国内利益集团格局的重构,将会限制甚至剥夺政府曾有的多种利益和权力。因此,如果能够彻底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对地方政府无异于一场财政革命。

中国的改革现在没有特效药!现在留下的改革领域都是那些难啃的骨头。改革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要有智慧,要寻找、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而作为“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需要对地方收入结构和收入体制的再造,并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约束性。

焦点评论

享受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木木

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由量变而质变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演进的过程都会显得极为沉闷而漫长。身处这样的“煎熬”之中,不同的人,其反应也会颇有不同。

一种表现是,在这个粗鄙过程的磨砺下,人们逐渐意志消磨,丧失了迎接伟大变革的勇气,缴枪、投降,最终失去了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能力,甘愿湮没于历史进程的背景中,沉迷于随波逐流的舒适、快意而难以自拔,并逐渐固化为层层量变积重中的一个个干枯的标本。

另一种表现是,极力否认曲折而漫长的量的积累的必要性、必然性,总是躁动于电光石火间丝丝缕缕的“异样”。

必须承认,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事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同样复杂的国际政经背景下,要保证这个事业的顺利前进,既不能因循守旧、踟蹰不前,得过且过,也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应该抱定足够的耐心,抓住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扎实地把我们的事业往前推进。这个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前进、实现伟大变革的过程,一定是值得每一个历史参与者享受的过程。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这个变革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在一些人看来,似乎颇不“解渴”,因为此前各界热盼的许多“关键词”,并未如期出现在公报中。

第二天股票市场的表现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干渴”的程度。但这显然并不妨碍这次会议注定要成为影响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变革走向的里程碑。因为出现在公报中的每一个“热词”,都将在今后的变革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一切社会实践(当然也包括资本市场的投资实践),这两种态度都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后者,更需要给予警惕。因为在如此认识的引领下,要想把我们的事业顺利推进向前,几乎没有可能。

必须承认,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事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同样复杂的国际政经背景下,要保证这个事业的顺利前进,既不能因循守旧、踟蹰不前,得过且过,也不能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应该抱定足够的耐心,抓住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扎实地把我们的事业往前推进。这个解决问题、推动事业前进、实现伟大变革的过程,一定是值得每一个历史参与者享受的过程。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这个变革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在一些人看来,似乎颇不“解渴”,因为此前各界热盼的许多“关键词”,并未如期出现在公报中。

第二天股票市场的表现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干渴”的程度。但这显然并不妨碍这次会议注定要成为影响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变革走向的里程碑。因为出现在公报中的每一个“热词”,都将在今后的变革中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

中国探索官邸制促进各地权力“进笼”



唐志顺/图

强化公有制经济亟需解决四大问题

莫开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表明新一届党和政府依然把“公有制经济”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首位,把公有制经济当作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物质基础,当作提高综合国力的坚强后盾。不管从哪方面讲,这个重大经济决策没有错,也切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要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作用,让其造福亿万民众,亟需解决四大问题。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我国长期占据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形成自然垄断性,一方面使其产出与投入不对等,效率越来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占据过多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处于弱势和被歧视地位,以致中小微民营企业长期遭受“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掣肘,并陷入“融资难、融资贵”困局。体现在分配关系上,就是国有企业员工收入和福利越来越高,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

为此,继续发展公有经济,必须首先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按公司治理结构重塑经营管理主体,提高效率。同时,打破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让非公经济享受同等资源权利和政策优惠,为非公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使亿万非公经济从业者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理想。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管理人员长期拥有高管和高官双重身份,且垂直管理模式使高管人员权力缺乏制约,一些高管在经营中独裁专行,造成不少重大投资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发展。一些高管在个人生活待遇上追求高享受,高工资、高职务消费等乱象突出,并引发了大量贪污腐败案件,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企业成为众矢之的,也使国有企业社会作用在民众心中被大打折扣。为壮大公有经济,应重点解决好发展与监管问题,敦促国有企业建立市场运作机制,让市场决定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减少行政干预,逐渐褪出行政色彩,使国有企业不断适合市场发展要求,成为真正的企业。同时,政府应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建立投资责

任追究制度,对国有企业财务预算实行公开;对企业高管薪酬、职务消费严格规定;改垂直管理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同时监管,改变国有企业监管现状。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经营扩张环境监管上,长期处于滞后地位,导致产能过剩和自然环境恶化。我国石油化工、钢铁、电解铝、船舶等产业在经营扩张上依然走资源掠夺型老路,盲目追求产值,产业转型升级缓慢,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又造成资源过度开发,使许多资源面临枯竭。同时,由于追求自身效益,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加之地方环保部门监管不力,国企产生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继续坚持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应及时解决企业效益与社会责任问题;促使国有企业牢固树立长远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制定合理发展规划;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严格实施节能减排政策,遏制重产值轻环保倾向,提高产品科技、环保含量,使生产建立在推动社会环境优化基础上。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代

表利益身份上,长期边界模糊,产权不清晰;且由于财务约束机制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政府审计部门监管乏力,造成国有企业过多利润用于开发楼堂馆所及房地产等非主业领域,导致利益“自我膨胀”;同时,也造成国有资本收益过多滞留在企业内部,使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等手段流入员工腰包,既形成了“部门利益自肥”,也造成了国有资产差距,使民众对国有企业代表利益产生质疑。同时,也为国有企业高管违法乱纪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腐败“重灾区”。为此,继续保持公有经济特殊地位,应着力解决企业积累与利润分配问题:中央政府完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利润分配机制,将更多利润上交中央财政,遏制企业“自肥行为”。同时,建立高管及企业员工薪酬机制,抑制高管工资过高现象,推行工资信息公开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另外,各级审计部门加强财务监管,从重查处财务违规行为,遏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乱象,使国有企业真正代表国家和民众利益。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市银行监管分局)



4G发牌 箭在弦上

项立刚:像三星、LG以及华为、中芯、酷派、联想这类公司,他们肯定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杨骅:4G初期的终端提供商仍然会是3G时代那些领军的手机品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厂商能够像苹果在3G上突破一样,率先创造出一种多功能的,能够特别满足用户需求,并且适合4G网络支撑的终端,这样的企业会快速得到成长。

运营商“三国杀”

4G牌照发放的发令枪还没响,中国移动已“抢跑”。年初公司开始大造声势,宣布将推动TD-LTE 4G“双百”计划——网络覆盖全国地市级以上的100个城市,终端采购超过100万部。

杨骅:花钱最多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移动。原来建网成本中占大头的是基站费用,现在它的占比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且绝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房租、配套设备和传输。

项立刚:除此之外,还要用光缆把它接进来,还要供电,还要有其它的配套设备。让基站正常运行还要维护,必须有后备电源,有柴油发电机,这些也都是要花钱的。

理论.上,4G速度将是3G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下载一首7M大小高品质歌曲不到1秒;下载一集250M的连续剧1分钟左右;在线观看高清版《钢铁侠》,快进回看完全没有停顿感。浏览网页时,从主页切换到二级页面,轻轻一点立刻跳转,无需等候。

项立刚:但是对普通用户来说,最容易感觉网速提高的是中国移动的用户,因为移动原来的速率相对比较低,升到4G以后提速感觉会很明显。但是对联通用户来说,这个感觉不会特别明显。事实上,4G和3G相比不是革命,只是一个比较大的提高。

畅想4G生活

宋旭岚:终端是针对个人的,还会有大量的行业应用起来,这些行业应用需要很大的带宽。像智慧城市、交通管制、安防、远程医疗等。比如说像德电(中国)公司在2015年的商业计划里面提到,光是M2M(机器对机器的无线通信)规模就可以达到十亿欧元。

杨骅:前些年市场已经开始炒物联网概念,但是物联网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从网络角度来说,目前网络的带宽是不能支撑物联网应用的发展。物联网我们想象的可能比较简单,但是这里边包含大量安全性的,指令性的,各种各样的复杂信息。这么大的数据量,3G现有的这个网络是很难去支撑的。只有到了4G时代,在大带宽情况下物联网的应用才能真正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物联网真正的起步应该是在4G开始使用以后,他才能够有效地支撑物联网的应用。

4G网络商用在即,众多智能手机厂商纷纷展开行动。国际一线品牌主动出击,配以旗舰手机加入4GLTE阵营,9月,三星NOTE3和索尼M35T已经宣布支持4G制式。10月,HTC旗下首款大屏4G LTE智能手机HTC One max在中国大陆作了全球首发。

相比高富帅的国际队,国产4G手机商也在摩拳擦掌,不仅中兴U9815、华为D2-6070两款手机已经领取首批入网许可证,小米、OPPO等新晋国产手机厂商也将共同挑战国际手机巨头。

(文字整理:陈娇君)

《新财富夜谈》是一档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制作、每周日晚23:17在甘肃卫视播出的高端财经周播访谈节目,由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担任嘉宾主持。本版每周一回放该节目主要内容,敬请留意。